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魏立安

1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

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末，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中派生的。用决定于体，是体的外部表现或功能。所谓“见于外者为用，具于内者为体”。近代维新思想家本是本末一体论者，所以尽管前期多用“中本西末”，却终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也就很自然了。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者冯桂芬，1861年，他在《采西学议》一文中，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之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为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习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显然已初具“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同时他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尽管他仍称西方为“夷”，但他已肯定了中国采西学、制洋器、筹国计、改科举的必要性，建议学习西方制器之术，翻译西方书籍，培养新式人才。他还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与否，要以治国之法善与不善为标准尺度，“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强调“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②一面认识到了西方国家政治、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69页。

② 冯桂芬：《显志堂稿·集约堂算学杂记序》卷1，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和中国的落后状态，提出向西方学习；同时，又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在调和中西文化冲突中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冯桂芬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维新派转变的中介人物，他的思想对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都有极大的影响。“中体西用”自冯桂芬首创后分为两支。

(一)“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向西方学习，以振兴清王朝为目的的指导思想。开洋务事业之先的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中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为下乎功夫”，“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犷之俗，所以邦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为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①不难看出，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文物制度、纲常名教、封建政体都比西方国家优越，仍可维系久远。目前的危机是缺乏西方那样的军火机器，这是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末端，只能作治标之用。1872年，清政府采纳曾国藩、李鸿章的建议，为了学习西方技艺，培养技术人才，派遣幼童去美国学习。曾国藩、李鸿章规定幼童出洋后，必须兼学中学、西学，“庶不至囿于异学”。^②洋务派中比较激进的郭嵩焘虽然羡慕西方国家的“政教”，但他认为中国有别于西方，因之，也没有提出在中国建立议院的要求。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系统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说：“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称之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该书是系统阐述“中体西用”思想的著作。他竭力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认为清廷“良法善政”，反对维新变法思想，反对搞君主立宪，攻击变法维新思想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

所谓“西学”在甲午战前主要是指西文、西艺；战后则转向“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张之洞所谓西政的内涵当然不是君主立宪政体，而是译西书、办报纸、废科举、办学校等等。从以上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西学为用”的含义只局限于器物之变，尚处于“言技”的范畴。

(二)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派也主张“中体西用”，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实行君主立宪。早期维新思想家中，有人脱胎于洋务派，发展了“中体西用”思想，其内涵已有很大变化。集早期维新思想之大成者郑观应说：“中学体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纲柔，洞达政体。”^③其一，早期维新思想家强烈要求发展民间新式工商业。王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张发展民间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组织。马建忠则明确提出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以振兴民间新式工商业，公开指责李鸿章在上海公然规定“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实行官商垄断的行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中体西用”，包含着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谋求国家富强，对外进行“商战”的意图。其二，早期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他们继承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57页。

③ 《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

冯桂芬“君民不隔”的思想，进而明确提出中国应设立议院。王韬在《重民下》中指出：“……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陈炽在《庸书外篇·议院》中说：英、德“合君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是“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早在甲午战前，郑观应已认为设立议院“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混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①战后进一步提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②他还批判了“议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论调，要求在中国设立议院。那种认为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中体西用”思想是一致的、毫无区别的观点，显然是难以成立的。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亦主张“中体西用”，他们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中体西用”思想，不仅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积极鼓吹民权，要求参政，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变法。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冯桂芬之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没有超出“言技”的范畴，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政体，而早期维新思想家及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却不仅“言技”，同时也“言政”，主张改变封建政体，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其内涵已有本质不同。

2 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开端于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承袭“中体西用”思想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的求强之道，不仅要“言技”，还要“言政”，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化进程。二者的内涵虽有不同，但对近代化的推动作用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推动作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文化教育。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中体西用”作为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的指导思想，开始虽然强调维护传统纲常名教，把西学附会于中学之下，但却以和缓渐进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有首创之功。以后随着“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一步步走向废科举，兴学校，传播西方文化，对知识界起了启蒙教育作用。特别是在教育理论与制度上，孙家鼐、盛宣怀等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办学思想。孙家鼐在接受光绪诏命筹备京师大学堂时，即提出以“中体西用”作为国立第一所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京师大学堂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样板，全国各级各类学堂都以此为例纷纷仿建。此外，留学生的派遣，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显示出“中体西用”在我国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癸卯（1903年）学制，绝非偶然，正表明“中体西用”在文化教育近代化上所起的促进作用。

政治思想。“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思想巨变中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以外的一切国家包括近代西方列强在内，一概都被视为“夷狄”，“天朝独尊”、“华夏”优于“夷狄”，传统政体优于西方政体的观念根深蒂固，也因此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夏夷之防”“用夏变夷”思想。“中体西用”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氛围下，当中国的大门被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后不久产生的一种应变思想。自冯桂芬起，“中体西用”表面上是卫体，其实是开新，提出了进行思想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进步意义是颇为

① 《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第103页。

② 《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第223页。

明显的。

洋务派只“言技”不“言政”，目的虽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政体，但其利用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企业，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队伍，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西学为用”包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等政治内容，较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具有实质性的思想变革价值。维新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提出“民权”思想，要求全面变法，则更前进了一大步。

20世纪初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提出，虽然超越、取代了“中体西用”思想，成为真正的近代革命思想，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从纯粹的封建传统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渐进过渡的政治、思想模式和文化自救方案，其历史价值却是不应被忘却的。

社会经济。洋务派在19世纪60~90年代，迈出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发展实业的第一步。其所兴办的企业虽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但由于工厂机械化程度日高，为适应近代化生产技术的要求，生产管理也开始逐渐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因而具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洋务派办实业把中国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推上了大机器生产的起跑线，为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准备了必备的条件和起了刺激作用。其中，张之洞虽起步较晚，但起点却较高。他在着手创办近代军工、纺织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于创办近代钢铁工业。张之洞曾把自己主持创办的四大重工业企业和四大轻工业企业，称作“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湖北兴办了第一批中国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定了湖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使之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策源地和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此外，张之洞对民族工商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扶助，促进了湖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汉阳铁厂官商合办之后，他曾为之奏请免税10年；^①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后来也都直接转化为商办企业，从而扩大了民族资本的阵营。制麻局商办后，他也为之奏请暂免税厘，^②并建议清廷饬各省仿办。张之洞兴办近代工业，扶持民族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湖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推动了该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为改变“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局面，他还提出各省宜设立商务局，并派人试办汉口商务局，拟定商务局关于奖励新创机厂、保护体恤民族工商业等八项应办事宜。以后，上海、苏州、镇江、通州等地都设立了商务局。如果说张之洞的甲午战前主要致力于自身兴办企业，那么，甲午战后他则开始注意运用政权的力量推进民族工业的整体发展，为促进经济近代化作了一定的贡献。我认为，“中体西用”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中体西用”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当然，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毕竟是为了巩固、维护清王朝，自然有其局限性和反动性，这也是应当承认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齐万良

^{①②}《张文襄公全集》卷44、卷47，光绪三年楚学精庐刊本。